

編後語

台灣的民主化歷程及其成敗得失，向來是兩岸四地以至全球華人密切關注的一個熱議話題，在近年世界各地民主發展遭遇挫折、民粹主義方興未艾的背景下，回顧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歷程，重溫民主制度的本義，或許能夠為刻下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台灣九合一選舉工程，提供一帖及時的清涼劑。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以「論台灣民主」為主題，刊發的四篇文章均取材自香港中文大學第二屆「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張玉法縷述了1949年國民黨遷台以後，台灣的民主政制如何走過從「革命民主」到「民主革命」的曲折道路，並將不同時期主政者在推進民主發展方面的是非功過，娓娓道來。錢永祥、周保松和江宜樺的回應文章，對台灣的民主現狀與未來展望提出了深刻而持平的分析。三位思考冷峻的政治學者對台灣民主制度存在的種種問題不乏坦率的批評，但在字裏行間亦不失溫情與敬意，值得讀者用心細酌。

本期選刊的文章題材多樣，不乏佳作。李懷印的文章指出，在全球化時代，過去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和「現（近）代化」敘事，都無法充分回答中國如何從一個華夏王朝發展成為一個多民族現代主權國家的問題。他從國家轉型的視角對滿清入關以來三百多年的中國歷史重新分期，並提出相應的理據和解說，想必能在歷史學界引起進一步討論。的確，歷史書寫難免或多或少受到所謂「主敘事」或「宏大敘事」的制約，歷史學者要突破不同研究範式的框架，必須要有堅實的史料作為立論的基礎。李里認為，中共建黨早期並不像後來的黨史研究所言，業已成為一個擁有「鐵一般紀律」的列寧主義式政黨；在黨員跨省調動的問題上，不乏中央與地方博弈的現象，種種非常規的調動方式可謂層出不窮。過去中共革命的研究重視農村革命的視角，忽略了城市在情報、人員和物資輸送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賀碧霄指出1930至1940年代的香港，由於得益於資訊自由和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為中共輸出革命的窗口。豐籊的研究細緻梳理了建國後一對聚少離多的夫婦的一批往來書信，除了探討共產黨員私密的情感世界外，也揭示二人愛恨交纏背後，「共產黨員」身份及其政治符號所蘊含的深意。

最後，敝刊同仁懷着哀傷之情向讀者報告近月幾位老朋友過世的消息。編委楊國樞教授、韋政通教授分別在7月和8月相繼離世，他們對敝刊的早期工作給予不少的幫助。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有「光纖之父」之稱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亦於中秋前夕離我們而去，令人更添傷感。敝刊得以在1990年創刊，多年來為中國文化建設作出些微的貢獻，端賴當年高錕校長的一力支持，他的遠見卓識委實令人深感敬佩。